

2301

新都文史

〈八〉

四川省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新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袁礼金

副主任 吴光奎 张燮明

委 员 陈廷乐 赖先贤

胡华栋 邵志一

刘元湘 邓忠运

王光荣

前 言

蔡自立

用本县近现代历史演变中革命斗争艰巨、曲折的史实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具体活动的事迹，对群众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借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编辑《新都文史》的宗旨。

本集从1981年以来，由县政协文史资料组、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整理，先以油印继而铅印发表，并产生了良好社会效益的175篇资料中，精选出的篇章，大体按上起辛亥革命，下迄土地改革，分类编辑而成。

对收入本集的资料，编者在进一步校订、核实的基础上，对个别史实的记述，作了订正、补遗；对个别文字也作了适当的增删调整。

这些资料较为珍贵，是研究新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愿本集的问世，能够有助于读者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开拓未来，积极投身“四化”建设！

目 录

峥嵘岁月

- 我的青少年时代……………曾涌泉 (1)
- 我在新都县参加地下斗争的几点回忆……………黄 霖 (13)
- 新繁的四位革命先烈……………刘弄潮 (32)
- 辛亥革命新繁纪事……………钟泽周 (38)
- 中共新都特支活动片断……………黄家全 徐永成 (42)

抗日烽火

- 八年抗战新都人民的苦难与县贡献片断……………黄孝昌 (51)
- 中华自有雄魂在
- 抗日民族英雄王铭章滕县殉国记……………张燮明 (57)
- 王铭章将军传略……………谢孝经 (66)
- 新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秦长顺 (70)

民国政闻

- 新都县参议会的概况……………袁裕辉 (72)
- 解放前夕的新都民众自卫总队……………魏绍京 (78)
- 闲话新都繁民党……………魏宗万 (85)
- 从禾登乡看新繁县国大代表选举真象……………刘光友 (97)

新县国民党、三青团选举揭发……………李学天 (107)

往事拾零

杨康在新都……………张礼明 (108)

新都围城事件始末……………王化三 (110)

蒋介石枪毙吴德峰原因何在……………苏剑威 (124)

康泽与廖敏五之斗争……………王 焜 (131)

清白乡一次大火火纪实……………贾洪泽 (137)

民国时期新都市场交易一瞥……………工商志 (139)

解放前夕国民党新都县上层人物的活动……………姚宗禹 (143)

涂炭年代

“飞毛腿”之死……………魏伯岐 (159)

新繁四位退休教师的惨况……………袁圣谟 (161)

新繁城关商民罢市始末……………胡瑞久 栗德荣 (163)

喜迎解放

贺老总立马新都城……………本刊编辑部 (165)

我在新繁迎接解放的回忆……………杨光济 (171)

庆祝新都解放……………叶崇芬 (175)

披荆斩棘

我在新繁县的斗争……………王瑜山 (179)

新都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张毅 (198)
新繁剿匪及丁占茂遇害.....	冯化民 (209)
万安乡征粮工作组遇难始末.....	黄世忠 (217)
忆念袁新尧烈士.....	何毅 张发昌 (225)
四大运动亲历记.....	刘冠群 (229)

抗美援朝

新都县抗美援朝见闻.....	文史委 (238)
我赴朝作战.....	周继明 (252)
难忘的情谊.....	张国全 (258)

土地改革

我所了解的新都县土地改革.....	蔡自立 (263)
各界代表要求加速土地改革.....	关桂荣 (276)
我参加了新都县天元乡土地改革工作.....	范朴斋 (280)

我的青少年时代

曾涌泉

我原名吴大猷。1902年5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新都县桂林乡一个封建家庭里，青少年时代成长在封建黑暗的社会中，走的是坎坷的路，经过的是灾难的经历。早在七岁时，父亲就遭受了三年冤狱之害，在狱中气得重病，直到死亡的边缘。幼年的我陪着眼泪盈眶，愁容满面的可怜的母亲受尽了煎熬。十一岁父亡，叔父歧视虐待我们孤儿寡母，我又陪着母亲受罪。十二岁又遇到升学困难。我本应在1914年底小学毕业取得升学文凭，但因种种复杂的原因，全班未办毕业，未发毕业文凭。我无毕业文凭不得升学。经过半年斗争，县视学（全县学校的总监）才允许我去县立高等小学经过考试插班（早已开学半年的班）。那时新都县立高等小学的大半教师都是前清的遗老，不学无术，腐败不堪。但其中也有少数较好，特别是那个爱国青年王镜容，在他们之中俨然是鹤立鸡群。他才从成都大学毕业，来校任历史和英文教员。他生气勃勃，干劲很大，与学生打成一片，在校内他是最进步的一个老师。当他发现我在勤学苦读之后，就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引导我学历史，读袁了凡纲鉴，特别是有系统地给我讲了从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对我国的侵略，使我在少年时代就得知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知道中国封建社会

的腐败，由此就产生了雪国耻、救祖国的思想，因此对腐败的学校和学校中饭桶教员深恶痛绝，对饭桶教员经常提问题难他们。我们的算术教员鞠树东是一个大饭桶。他教我们日历算，但他自己就不会日历算。同学们早已对他怀恨在心。我从课本上提出的问题，他都不能解答，在课堂上当众出丑。他恼羞成怒，大发他封建老爷的威风，要罚我“立正”。我坚决抗议，仍要他解答算题。全班同学都愤怒极了，怒责他罚我“立正”毫无道理，也要求他解答算题。他真是不能解答，反骂学生胡闹，怒气冲冲地从讲堂逃跑了。于是我们就一致决定罢课赶他，要我去同校长办交涉。但校长和鞠都是一丘之貉，坚决包庇鞠而同我大吵一场。于是我们就连校长一起赶，到县府去告状，但校长与县府也有勾结。县府对此案采取拖延来瓦解学生，使问题长期拖着不能解决。罢课持续太久，遭到家长们的反对，罢课就此终止。因此我也丧失了斗争武器，无法再斗。于是我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怒斥学校包庇鞠树东，是狼狈为奸，我不屑与他们这些狼狈为奸的人们为伍，自请退学。同时，我也给同学们写信说，原来我们和老腐朽斗争是一致的，现在你们中途不干了。外国人说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血，希望你们以后要多五分钟热血。校长看了我给他的信后，立即挂牌斥退我。同学们看见斥退牌，非常气愤，派代表来请我回校，要和我一道继续斗争。但我对他们说，我给校长的信是讨伐檄、是挑战书，校长看见，必然火冒三丈，当然要斥退我。这是我早已预料清楚的事。你们不必大惊小怪，请你们回校安心学习好了！任何学校都不收被开除的学生。所以王老师（我出川后，听说他也

变为官老爷了)给我改名为吴大成,号集之。他是要我学孔子“集群圣之大成”。这是明显的封建思想。我接受了这个封建名字,可见那时我的思想主流还是封建的。

1918年我上成都进华阳中学。在成都,我最大的幸运是第一次有机会能读到进步杂志《新青年》。它不断给我渴望的新知识,扩大我的眼界,提高我的水平,促进我的思想,它成了我最热爱的读物和崇拜的导师。它发表的鲁迅《狂人日记》和关于“打倒孔家店”的一系列精湛的文章,使我深刻地认识封建主义的罪恶,改变了我以前的封建思想;它高举两面鲜明大旗——科学与民主,给我少年形成的空洞的救国思想充实了具体内容,因而形成了我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我在中学就特别重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和英文的学习。当时《新青年》所宣传的思想还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紧跟《新青年》走,是我的思想由封建的转变到资产阶级的。这是我思想的一个大转变。

“五四”运动中,我代表华阳中学参加成都学生联合会工作,在学联领导下成都学生不断举行过一系列抵制日货的罢课和示威游行。此外,当时“劳工神圣”这一口号已改变了先进学生轻视劳工的错误观点,而开始向劳工做工作。其中主要是办贫民夜校,帮助他们学文化。办夜校起码要黑板、粉笔、免费供给学生课本、笔墨纸张。这项费用开始由热心办夜校的学生节衣缩食挤出不大数量的钱来开支,但随着夜校数量的增加和扩大,由学生身上能挤出的钱就远不够用。于是我们就在1919年冬初,利用一个星期日,在少

城公园演“文明戏”（反封建的话剧），为筹办夜校基金募捐。大军阀刘存厚为破坏此事，就指使他的大批所谓“伤兵”来捣乱，要免费看戏。经学生婉言劝阻无效，这些彪形大汉的“伤兵”就拳打脚踢地打进戏园，捣毁一切，追打学生，破口大骂和侮辱学生；同时在公园外的广场上也发生了军队捣乱，驱逐追打正在场上踢脚球的学生。这两件军队的暴行立即引起了全体学生大怒，宣布罢课，提出惩办祸首、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等要求。全城大、中、小学罢课达三个月之久，没有达到惩办祸首……等要求，在压力下被迫复课。我坚决主张继续罢课，反对中途复课，但未成功，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刘存厚就有可能把我当做罢课的罪魁加以逮捕。因此我逃到另一个军阀刘湘势力下的重庆，在一个教会中学暂时栖身。这个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成立过学生会，后来被洋人解散了。我到校后，与学生中积极分子共谋，经过斗争恢复了学生会组织，为该校学生争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我同该校全体学生又去参加重庆全城学生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早在1919年7月，《新青年》出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载了很多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以李大钊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马克思主义较为全面。我怀着惊喜的心情再三读了这一专号，尤其是李大钊同志的那篇文章。我第一次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初浅知识，我很热爱它。以后《新青年》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第一辑《社会主义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都作了系统的全面论述。我用了

课外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一大本书从头至尾认真阅读完毕，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全貌得到了一个初步概略的了解。于是它就成为我爱好的学说。以后，凡讲新社会主义书刊，就成为我课余的爱好的读物。这是我的思想的又一转变，由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爱好者，但还未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在我早已形成的科学救国思想的支配下，我的正课学习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所以我在1922年进唐山交通大学学铁路工程，甩去我的封建名字吴大成，而改为吴梓材。因为梓是乔木，质坚而用广，我愿做一个质坚而用广的人。

1922年10月，唐山四万工人大罢工。工人在外国资本家和军阀的压迫和屠杀下，英勇斗争了很久，罢工经费发生了困难。我们出于民族感情和义愤就罢课上街，三百多学生分向唐山全市各条大街小巷，向每个商店、每家住户逐一进行宣传募捐，结果很好，募得可观的捐款，对罢工有一定的帮助，对这次交大学生募捐，党中央给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中央负责人周和森同志在1922年11月13日（募捐后第三天）即在党刊《向导》第10期上用鲜明的标题“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来赞扬交大学生这一正义行动。他特别指出这“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且是中国知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的证明。全国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知识阶级和学生，都要学习唐山交通大学学生的模范呵！”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却把这一模范视为洪水猛兽，非消灭之不可，立即调来军队包围了交通大学，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学生分别看守着，最

后把全体学生武装押上火车，直送北京车站，赶下火车就不管了。有钱的学生去住学生公寓，我和几个四川穷学生只能住免费的四川会馆，既无火炉，又四面通风，熬过了一个寒冬。我们在京东奔西跑，四方求救，到教育部、交通部、总统府请愿，都是白跑！直到1923年春，北洋军阀原来的内阁倒了，旧校长也随之而倒，另一派组织新内阁上台，新校长才让学生回校复课。

这次学生横遭惨祸，是北洋军阀给我们进步学生上了一堂生动而有效的课，使我们的思想大为提高了一步。我的觉悟也有提高，对于我的科学救国思想发生了怀疑，使我认识到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无法救国的，使我认识到还有进一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我加入了党团的外围组织——社会学研究会（实际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随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读书的兴趣和重点，也有了转移，转移到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主，而把上课作为一种应付。

1924年春我找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即加入。

我自从1919年7月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到入团，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利用课余零星地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我读书的重点和兴趣转移到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以后，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更多了；虽然还没有学好，但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已有一些初浅的认识，因此可以说我入团是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准备的。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变：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的爱好的学说转变为把它作为我的行动的指南，我由空谈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终身为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战士，为了把这个转变保持下

，我想给自己取一个具有这种涵义的新名字，以使我深刻记住，终身不忘。那时，我很喜欢庄子所著的“盗跖”那篇寓言，因为：第一，它描绘的盗跖怒骂孔子，是比《新青年》发起反对孔丘的言论早了二千多年；第二，他描绘盗跖“从众九千，横行天下，侵掠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这俨然是一幅武装起义的图景；第三，它描绘出“跖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这又说明他的思想非常活泼，它不僵化，所以才会有上述两种革命行动。因此我借用“涌泉”来表达我已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決心：一定要象“涌泉”那样永远，一浪不停地向上涌涌，引为终身的鞭策，同时也把旧的封建的求学的吴姓甩掉了，以示与它决裂。

自1923年后，唐山交大的党团有了很大发展，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决定要从交大选派五人到苏联学习。我是其中之一。到莫斯科后，我们进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

我进东大时，第一批1921年到东大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已经回国，只剩下罗亦农、王一飞两同志做翻译和担任旅莫支部的领导工作。当时在东大学习的除从国内去的唐山的五人、湖南的三人外，其余都是1923年从法国去的，有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熊雄、刘伯坚同志等，还有叶挺同志（由国内去的）。我们在旅莫支部领导下欢聚一堂，互勉互助，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同志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关心东大的学生，尤如关心国内革命青年一样无微不至，在百忙中总

是挤出些时间步行到东大来了解我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同学们广泛接触、谈话，对我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惊喜万分，跑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是您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引导我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又引导我来到东大学习。见到您，我高兴极了！”他谦虚地说：“这也与你的觉悟和努力学习有关。今后你在东大要更加努力学习。”以后每当他来东大，我总要找机会去见见他，简单地谈一会，那怕是极简单几句话也好。在这些简谈之中，我也受到许多深刻的教育。他学识渊博，态度和蔼，对青年热爱，时刻深入地做群众工作，他的高尚品德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对我形成终身坚定的革命意志影响很大。

“五卅”事件发生后，旅莫支部决定全体学生回国。罗亦农、王一飞先走后，刘伯坚同志负责旅莫支部领导工作，安排各批同学回国事宜。他要留我、王人达、武和径等人做他的助手，然后一同作为最后一批回国。正当我们最后一批打点行装准备出发时，邓小平同志一行由于在法国举行抗议活动被驱逐出境来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留他们在莫斯科参观、学习，需要人工作，这样我们最后一批的回国就被吹了。“五卅”运动之后国内革命高潮，党中央派大批干部来东大学习，缺乏翻译，我便开始做英文翻译。由于苏联教师会讲英语的不多，旅莫支部要我突击学习俄文。我会英文学俄文较容易，几个月后，就做俄文翻译了。

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冯玉祥就派了大批高级军官到苏联参观学习。受共产国际委托，刘伯坚 我和武和径同志等

都去向他们做政治工作。继而冯玉祥又派来几百名青年军官到步兵、炮兵、飞机学校去学习，我则被派到列宁城飞机学校去做冯玉祥的青年军人的政治工作。因东大急需翻译，调回东大做英文翻译。那时旅莫支部办了个《前进报》，刘伯坚同志任主编，我也参加《前进报》的工作。1926年春末夏初，冯玉祥带着家属及随从来到莫斯科。受共产国际委托，刘伯坚、我和武和径同志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前去访问他，向他做工作，直到他离开莫斯科。冯玉祥回国后，夫人李德全留在莫斯科，我被派到她的住处做她的政治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都认为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决定派大批适合学习军事的同志学军事。刘伯承、左权等同志被派到陆军大学学习，肖劲光、付钟、李卓然和我被派到列宁城军政学院学习，我并兼任该院中国工人班的政治文化教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党中央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决定从在莫斯科各校学习、各机关工作的同志中抽出一部份同志支援远东前线。那时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委员的一部份，以及在陆大学习的刘伯承同志，广暴主力军的首长叶剑英同志等都被派去支援远东前线。列宁城军政学院也去了一批同志，是由我带队去的。我到远东后在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工作。“中东路事件”很快结束了。联共中央在事件过程中发现列宁的民族政策在远东中国工人中没有落实，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很严重，决定要留下大批中国同志来帮助华工、华侨的工

作。我也被留下。那时华侨中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缺乏由华工、华侨中产生的基层领导干部，二是缺乏对华工、华侨进行教育用的书籍和教材。我留下担任远东中国出版部主任，拟订了华工、华侨需要学习的书籍、教材的题目，广泛地在伯力的中国干部中，海参威的中国学校的教员中，组织有写作能力的人写文章和小册子，同时也写信给莫斯科各学校动员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参加这一写作工作。这样，很快基本上解决了书籍和教材缺乏的困难。为培养华工、华侨的基层领导干部，我除了兼任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教员外，又参加每期矿工轮训班的工作，当教员讲课。很快就基本上解决了缺乏基层干部的问题。上述两个问题基本解决后，我就提出离开远东回国的要求。但是远东边疆党支部不肯放我。我又多次给共产国际写信，几经曲折，远东党支部才同意我回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派我到内蒙古工作。我在内蒙把那里的情况调查清楚后，写信给共产国际作了书面汇报。共产国际收到我的书面汇报后又令我回去做当面的汇报。这样我又一次回到莫斯科。

我这次回莫斯科后，受到两次迫害。第一次来自王明，当时他已篡夺党的领导大权。他是个野心家，专制魔王，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那些不肯吹捧他、不顺从他，不满意他和反对他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迫害了很多，把他们送到工厂、矿山去受折磨。有些人被折磨致死。我也是被他迫害者之一。他曾撤销我的翻译工作，把我赶到加里宁工厂去劳动。后来只是因为共产国际在第七次国际大会之后，要把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陈

云、陈潭秋、滕代远、周和森、曾三、孔原等同志组成一个秘密学习班，需找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的翻译，才想起了我，把我从加里宁工厂调到这个秘密班里工作。

第二次来自这个秘密班所在的列宁学校的校长克尔山诺娃。她曾经包庇两名中国托派分子。陈漂秋同志知道后，向主管列宁学校的列宁山区委写信控告她。信由我翻译成俄文，并相约在他的信发出后，我在学校里揭露此事，形成内外夹攻。后来我就在教职员党员会议上揭发了校长的包庇行为。因此校长对我怀恨在心，利用1937年肃反扩大化的机会开除了我的工作。我多次找她质问原因，她都闭门不纳。于是我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她对我打击报复，并请求审查我的全部工作经历，以便我回国工作。经过认真调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在会议上作出了正式结论：我确无任何问题，并批准我回国工作的请求。

第二次回国到延安后，我直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一帆风顺，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我讲述完我的青年时代后，我必须强调：我国今天的青少年实在是太幸福了！他们身处福中应当做到知福，应当知道这样的幸福来之不易。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千百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用头颅和鲜血争取来的。这样的幸福来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掌握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必须在年青一代中间建立起革命的雄心壮志，培养勤学苦练的作风，使他们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在